

● 东方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文化与日本

史善刚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
给世界东方文化
的开拓者传播
者和探索者们！

《东方文化研究丛书》序

陈玉龙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制定的《东方文化研究丛书》编撰设想，深感这个设想表现出进取开拓的气概和蓬蓬勃勃的生机。读后仔细吟味，浮想联翩，不胜雀跃。

这确是一项具有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的富有开创性的《芳草计划》。它是当前东方文化研究领域中出现“周易”热、“孙子兵法”热、“汉语”热……应运而生的宁馨儿！是强劲的东风第一枝！是“一枝红杏出墙来”！

河南，古中原之地，人们惯称“中州”，东、西、南、北、中，中者“宅天下之中”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它有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有好多锦绣文章可写，有好多美妙图画得描绘。中州儿女们向祖国母亲和神州大地奉献出一片赤子之心和一份珍贵的反哺之礼。可以说，出版这套丛书，是中州学者们呕心沥血之作，应予以充分肯定。

放眼全国，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成立好几年了。它是一个方向明确、讲究实效的国家级民间学术团体。近两年来，它扎扎实实地抓了几件大事。如：《东方文化集成》开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东方》杂志创刊等。前两项是跨世纪的巨大工程，为举世所瞩目。而《东方》则是大型的、综合性的、高品位的、学术性与知识性兼而有之的杂志，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喜爱，河南省东方文化研

究会作为它的一个分支,也秉承着这一优良学风脚踏实地的推出这一编撰设想。所谓“枝繁叶茂,益固其本”,诚哉斯言!仅就出版这套丛书而言,可谓洋洋大观,其覆盖面之广,挖掘度之深,实令叹服。曹丕《典论论文》有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丛书的执笔者多系中州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饱学之士和睿智之才,可谓集全省之精英,成不朽之盛事。

“敢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楚辞·九歌·东君》),身居京华,聆此佳讯,临颖神驰,谨致贺忱。

东方,充满朝气;东方,充满希望。满目璀璨,一片辉煌。我衷心预祝:计划一步步实现,丛书一本本问世,我国的东方文化研究也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可贵者,此一发轫也。

瞻望来兹,无限振奋。我们即将叩启新世纪的大门,前景十分壮阔。古语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镆基,不如待时。”方兴未艾,引弓待发。愿中州诸君审时度势,发扬蹈励,驰骋才华,开拓新城,辛勤笔耕,真积力久,自有佳构名篇,纷纷脱颖而出,开绚丽之花,结壮硕之果,国人有厚望焉。古稀老翁,亦不胜翘首渴望之至!

是为序。

甲戌盛夏京口陈玉龙谨识于燕园三苑堂

《中国文化与日本》序

获知中国及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将出版《东方文化研究丛书》，并先睹了史善刚先生所著丛书之一《中国文化与日本》文稿。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殊属重要，因而很愿意在这里写几句话。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往来交流，对于双方历史来说，都是有很大意义的问题。古代日本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其历代学者多研习中国文化，论作极多。这与西方接触中国文化较晚，后来才有汉学兴起的情形，自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文化在日本所起的影响作用，至为深远，日本学者所述甚详。例如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著《亲魏倭王》一书，前言开宗明义便说：“日本与中国关系深长。日本文化中存在的中国自古以来的影响，难于确计，我们尚不了解的仍有许多。”（日本学生社出版，1971年）这番话的正确，无论是从文献上、考古学上，甚至在民众日常生活中，都不难举出大量证据来说明。

我幸有机会多次访问日本，特别是参观日本的种种文化遗迹，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有十分深刻的印象。看得越多，越觉得对两国文化比较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入之必要。几年前，我曾呼吁进行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小著《比较考古学随笔》说过：“由于地理的接近，人民的往来，同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自当推中国周围的国家地区。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过探讨……如中国与日本间的文化交流，两国学者长期以来从考古学方面加以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课题。”（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从事这种比

较研究,对研究中、日关系固属必需,就是对专治中国文化的学者,也会大有裨益。

出于自己专业的兴趣,我很想知道一些早期历史上中、日文化间的关系。好在近年关于日本早期文化的研究,颇见兴盛。于中、日等国学者之外,西方学术界也有专攻这方面问题的,且有专著出现。如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基娜·伯恩斯博士撰有《原史时代的大和,日本最早国家的考古学》(Gina L. Barnes, *Protohistoric Yamato,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Japanese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便很有价值。中国对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有重视早期的趋向,如徐福的讨论成了热点,有专著、论文,还成立了协会,办起了刊物(《徐福文化交流》)。看起来,有关的学术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今后有着扩大发展的余地。

当然,关于较晚时期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因为涉及的时代更长、范围更广,成果的内涵尤为丰富。史善刚先生这部《中国文化与日本》,吸取了前人多方面的研究所得,集中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上,为读者勾划出自古至今的发展线索,提出一系列启人深思的问题。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于儒学、佛学等思想文化方面尤多措意,使我们想到学术史,特别是近现代学术史上中、日间的关系问题,非常需要发掘探索。现有的学术史论著,在这一问题上每每令人感觉不足。如果大家在读过本书之后,能注意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有益于文化研究的进展。

中国文化的传播,中、日文化的交流,是整个东方文化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关捩。研究这方面问题,也不可不以整个东方文化的产生绵延作为背景。自从东、西方文化彼此相遇以来,东西文化的考察和比较一直是世界学术界关切的中心。日本学者常以“东洋”、“西洋”对称,比如讲“东洋史”、“西洋史”,这种提法自有其渊

源,但“东方”一词不限一国,开阔了研究的视野,实有可借鉴之处。现在大家谈的东方文化,包括亚洲东部由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形成的一大文化圈,曾对人类文明多所贡献。从中国文化与日本这个问题入手,便能窥见广大东方文化的美富。史善刚先生本书的列入《东方文化研究丛书》,是应该特别值得欢迎的。

李学勤

一九九四年十月九日

于北京紫竹桥畔

封面设计:田 凯

版式设计:汤淑君

中国文化与日本

史善刚 著

责任编辑 张继红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5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65千字 8插页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15-00011-4/K·206

平装定价:15.50元

精装定价:20.00元

中国文化与日本

目 录

序	李学勤(1)
第一章 “渡来人”与日本先史文化.....	(1)
一、“渡来人”的由来	(1)
二、绳文时代文化的输入	(3)
(一)徐福——中日千年友好的象征.....	(3)
(二)弓月君和阿知使主.....	(8)
(三)水稻的输入与社会的变更	(11)
三、弥生时代文化的输入.....	(13)
(一)“渡来人”与文物考古	(14)
(二)倭奴国与东汉王朝的通交往来	(21)
(三)邪马台国与曹魏的交往及其文化的输入	(22)
(四)倭国与刘宋王朝的交往及其文化的输入	(26)
第二章 遣唐使与大化革新	(38)
一、遣隋使的目的、组织及其作用	(39)
二、遣唐使的组织、往返、主要内容及其文化的汲取.....	(44)
三、遣唐留学生、学问僧与中国文化的输入	(59)
四、遣唐使期间文化汲取的深入.....	(73)
五、推古改革与大化革新.....	(78)

第三章 宋元文化与日本	(93)
一、入宋僧的目的、方式及其概况	(93)
二、日僧杲然与宋太宗的回答	(100)
三、宋禅僧与镰仓武士	(103)
四、镰仓时代文化的输入	(107)
五、元僧东渡与文化的传播	(115)
六、入元日僧与文化的输入	(119)
第四章 明清文化与日本	(134)
一、遣明使与勘合贸易	(134)
二、入明日僧、渡日明僧及其文化的移植	(163)
三、清朝与日本贸易文化的深入	(168)
四、渡日明清人与文化的输入	(174)
第五章 中国化的佛教与佛教的日本化	(186)
一、中国佛教的渊源、流传、嬗变及发展	(186)
二、中国化佛教宗派	(193)
三、中国佛教的东传	(205)
四、日本佛教的发展、嬗变及其“日本化”特点	(212)
后记	(243)

第一章 “渡来人”与日本先史文化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既深且远。这一问题，从时间上来讲可上溯到数千年前。不管从文字记载方面或文物考古方面，都足以说明远在先秦时代中国文化即已传入日本。自周秦至汉魏六朝，通过移民和其他途径，中国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技术源源东传至日本列岛，使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大的质的飞跃，即由以狩猎渔捞为主的采集经济，进到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经济，结束了长期停滞的绳文时代，开启到了一个新的弥生时代。笔者仅拟就以此为题，从下列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渡来人”的由来

在日本的史书上，记载着中国移民到日本而被叫做“归化人”^①的称谓。“其所以用归化这个词，当然是认为外来移民慕日的文明而前往归化定居的；其实，在古代日本史籍上称为归化人中，有不少是在到日本的时候，带去了本国的先进文明，促成了日本列岛的开化”^②。看来，日本人把外来移民（包括中国人、百济人、高句丽和新罗等）称作“归化人”，尤其是放在古代这个历史框架上，显然似有妄自尊大之嫌。

站在历史置高点上来审视，战国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到了铁器

时代，不仅有了铁手工工业，出现了铁制的兵器和铁制的生产工具等，而且又开始了炼钢业。然而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列岛上，还仅处于氏族社会的母系制社会时代，那时的日本土著居民仅使用极简单的石制工具，虽已进入新石器阶段的绳文时代，但和中国相比则落后了几千年。在尔后的两千多年间，先是由中国移民把先进文明和技术带到了日本，变那里的采集经济为农耕经济，迅速跨入了弥生时代；继之是日本派遣大批的遣隋使、遣唐使，回国后实行汉化和唐化，直接导致了日本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改革——大化革新，为过渡到封建制度奠定了基础；到了近代，日本又把学习的重点导向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出现了在日本近代史上最西化的改革——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超前发展，跑到了中国的前边。然而好景不长，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使中日两国人民共同陷入了战争的苦难深渊，破坏了千年友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则是以战败国的姿态跻身于世界之林的。大概也就在这一时期吧，日本史学界一改了对中国移民的不尊称谓，把“归化人”改称为“渡来人”。“渡来人”的名称由是而来。这一名称的改变，可能是日本史学界经过沉痛反思之后，认为用“归化人”既与千年历史事实有违，又会滋长日本人的狂妄心理，因此之故才把中国移民改定为“渡来人”的。

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史书是《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纪》(公元720年)，这两本史籍都产生于八世纪。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记载日本历史靠的是神话、传说和口头传承，一般把这一漫长段历史称之为先史时代或“阙史时代”。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考古发现来研究农耕文化的起源时，普遍认为水稻来自中国的江南；最早在日本列岛上从事农耕

的，不是日本的土著居民而是大批的“渡来人”。这样以来，关于日本先史文化与“渡来人”的关系问题就需要探讨一番了。

二、绳文时代文化的输入

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是日本先史时代的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从公元前三、四百年的绳文时代后期开始，到公元二、三百年的弥生时代后期为止，这六、七百年间在日本列岛上是如何经过了几千年的停滞之后，由原始社会突变到奴隶制社会的。其原因没有别的，正是由于外力（渡来人）作用的结果。

（一）徐福——中日千年友好的象征

在中国的史书上，记载中国移民到日本，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徐福了。司马迁在《史记》上记载此事的有四处：

一曰：“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③。

二曰：“始皇闻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④。

三曰：“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⑤。

四曰：“（秦始皇）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

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神曰：‘以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⑥。

以上四点大体概括了徐福东渡故事的全部内容：

徐福(市)⑦，秦时山东一带的齐人⑧。他以方士之名，说海中三神山⑨之由，向秦始皇上书，要求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前去求取仙药；秦始皇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率数千名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其时为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

数年之后不见徐福归来，加上知名儒生如侯生、卢生等的相继逃亡，使得秦始皇大为恼火。于公元前 212 年(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念起给徐福“费以巨万计”而“终不得药”时，以为徐福很可能如同侯生、卢生似的，是斯骗了他一去不复返了。如此又及种种，始皇决定不仅要“焚书”，还要“坑儒”方可“兴太平”。

公元前 210 年(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⑩，行至琅琊时，不料徐福前来求见。徐福入海求仙药，一去数年而不得，回来后怕受谴责，只好在始皇面前又“诈”出一个神话来，说是“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要求要增派武装力量(善射手)及武器(捕巨鱼具)。始皇又一次答应了他的要求，增派善射者并携捕鱼具同行入海。

徐福又一次(具体时间不明，记载有误)以谎言博得秦王信任。秦王这次非常高兴，按照徐福的说法，允诺了海神所提出的条件：另派百工之人，并随带五谷种种，与三千童男童女再度前往。此次徐福泛海而来到了“平原广泽”⑪，久居于此终不归了。

继《史记》之后，在中国的史籍中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均有记载此事的：

在《汉书·伍被传》中有云：“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亦云：“会稽海外有鲛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今会稽市。会稽、东治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又有云：“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在以上三家史书之记载中，除与《史记》有相同之外，又增加了两项内容：一是在《汉书·伍被传》中增加了“多赍珍宝”的内容；二是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中又出现了“夷洲”和“澶洲”两地。而且指出徐福所到之地就是这“夷洲”和“澶洲”。

正史记载有关徐福东渡的故事，大抵如上所述。在尔后的非正史的记载中，对此更不乏其例，而且还把徐福所到之地与日本列岛连在一起了：

五代时的义楚，在他的《六帖》卷21《国城州市部》中有云：“日本国亦名倭国，在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止，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在义楚的《六帖》中，记载徐福东渡之事有两点：其一，第一次明文提出“日本国亦名倭国”，也就是徐福所到之国；其二，日本的富士山又名蓬莱山，其山高峻，三面环海，是一个喷烟的火山，徐福率童男童女就定居在这里，其后“子孙皆曰秦氏”。

与义楚之记载有同样含义的是北宋欧阳修。欧阳修在他的《日本刀歌》^⑫中云：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卅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今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又一次提出徐福所到之地就是日本。这和义楚的认识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欧阳修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说，徐福入海时除携带五谷种种外，还有包括《尚书》百篇在内的一部分书籍。这些书是秦始皇“焚书”的幸存者。只因日本的法令森严，无法带回祖国罢了。

综上两例可以看出：第一，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自司马迁在《史记》上的反复记载为起始，一直流传到唐宋，延续达千年之久；第二，关于徐福入海的所到之处，从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到欧阳修所记的日本列岛，至此才算把徐福与日本联系起来了。不管是义楚或者是欧阳修，他们所讲的日本列岛，虽无确凿的根据和凭证，但亦绝非各自的杜撰和臆造。由此看来，把徐福所到的“平原广泽”与日本联系起来的说法，大约就是始于唐五代时期。

那么，从文字记载来看，在日本又是什么时候提到徐福的呢？

南宋禅僧无学祖元（公元1226～1286年），于1279年应日本

之邀东渡日本后，有一首《徐福词献晋诗》云：

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

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

祖元是浙江明州(宁波)人，他东渡日本，虽然是应了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将军北条时宗的邀约，但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处境。当元军南侵时，他曾避入禅寺，元军曾以兵胁迫他降，他岿然不为所动。赴日后在镰仓创立圆觉寺，自任第一代住持，圆寂后谥为：佛光禅师。由是观之，祖元这首诗是有寓意的，旨在借缅怀徐福寄托自己的思国之情。在他的这首诗中，亦可窥知徐福词和徐福墓是在十三世纪以前就已存在了。

北畠亲房在他的《神皇正统记》中载有：

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老药于日本；日本欲得彼国之五帝三王遗书，始皇乃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因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

《神皇正统记》成书于1339年。从时间上来看，就是说十四世纪关于徐福东渡之传说，就已经广为流传且见诸文字记载了；从内容上讲，北畠亲房所提的“遗书”和“全经”，大抵和北宋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所说相类。

事情有如此地循环往复。徐福的传说先是在中国，尔后又流传到了日本；然而在日本广泛流传之后，则又回到了中国。入明僧绝海中津，在他来到了中国后写了一首诗云：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两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明太祖朱元璋步其韵而唱和曰：

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